

异境想象与现实摹写：明清小说中洞庭湖书写的双重镜像

谷文彬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明清小说中洞庭湖书写呈现出双重镜像之表现, 洞庭湖既是一个承载了爱情和神仙的文化记忆的异境空间, 又是一个见证了灾害和动荡的历史事实的现实空间, 从而表现出既有一脉相承的一致性和前后关联的逻辑性, 也有细微隐秘的差异性和前后转化的变异性。这一特性的形成, 既与源远流长的洞庭湖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也与明清时期水灾匪患的现实有关, 小说家借此表达忧民情怀, 思索生命价值, 拓展了洞庭湖文学景观的边界。

关键词: 明清小说; 洞庭湖; 双重镜像;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3-0170-11

得天独厚的山水之胜的洞庭湖^①, 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之湖, 更是一个文化精神之湖。明清小说中以洞庭湖及周边地区为故事主要发生地的文言小说约有 56 篇、白话小说约有 45 篇。目前, 学界对明清小说“洞庭湖”书写研究尚属阙如。事实上, 明清小说家一方面绍继了历代文人有关洞庭湖的文化记忆, 另一方面又对洞庭湖进行现实摹写, 从而呈现出双重镜像: 作为异境空间, 承载了爱情和神仙的文化记忆; 作为现实空间, 见证了灾害和动荡的历史事实。鉴于此, 本文将对上述文学现象予以探讨。

一、明清小说洞庭湖书写双重镜像之表现

洞庭湖自古以来便是小说的重要发生地, 比及明清时期, 小说家对洞庭湖的书写既遥接唐宋, 讲述神仙鬼怪与爱情故事, 又发生变异, 开始关注洞庭湖的灾害和社会动荡等问题, 从而使小说中的洞庭湖书写呈现出双重镜像。

(一) 传奇与志怪: 明清小说洞庭湖书写承传

明清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是以洞庭湖为背景的, 如碧山卧樵《幽怪诗谈》, 张潮《虞初新志》, 蒲松龄《聊斋志异》, 袁枚《子不语》《续子不语》, 烟霞主人《跻云楼》, 等等。明清小说家接受了前代作家对洞庭湖的文化认知, 继续在小说中将其作为一个浪漫之地加以描绘。

在明代作家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中, 叙崔宁和秀秀私奔到潭州, 开碾玉作过活, 后二人又被抓回咸安郡王府。崔宁和秀秀私奔至潭州, 一是因潭州距咸安较远, 如崔宁对秀秀所说: “这里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 料得无事, 你我安心, 好做长久夫妻。”^②二是与洞庭湖的文化记忆有关。正因洞庭湖在小说中历来被塑造成爱情圣地^③, 其中所隐含的文化隐喻, 唤起人们对此地的回忆与向往, 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形成了人与洞庭湖的情感联结。崔宁和秀秀的私奔透出洞庭湖穿越时空, 已由一处自然地点转化为自由爱情场所的象征。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六篇故事直接发生

收稿日期: 2023-11-20; 修回日期: 2024-0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知识学视阈下明代书目小说著录研究”(22FZWBO38);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小说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接受研究”(23A0128)

作者简介: 谷文彬, 女, 湖南张家界人, 文学博士,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小说史及小说文献, 联系邮箱: 524664631@qq.com

在洞庭湖，皆述神仙鬼怪之事或爱情故事。据朱一玄考证，《织成》这篇小说脱胎于唐传奇《洞庭灵姻传》(又名《柳毅传》)，两者所叙之事皆发生于洞庭湖，情节也极为相似。因此，我们在探讨明清小说洞庭湖书写对前代小说的继承时，《织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织成》与《洞庭灵姻传》这两篇小说相似之处甚多：第一，柳生和柳毅皆为落第书生且都姓柳，织成和龙女皆非凡人；第二，他们皆因洞庭湖结成姻缘；第三，他们在初次见面时都姻缘未成，柳生被洞庭君放走却并未带走织成，柳毅亦是拒绝和龙女成亲；第四，织成和龙女皆有身份不显之时，柳生并未见得织成面貌，因此后来见织成时未能认出，只能靠织成之袜辨认身份，龙女先是变作寻常女子嫁给柳毅，后来才告知其真实身份；第五，故事末尾均有赐宝的情节，柳生和织成成亲后，得洞庭王妃赐宝，柳毅表弟途经洞庭时，得柳毅赠长生药。虽然与《洞庭灵姻传》相比，《织成》没有送信、救人等情节，故事场景也从水下龙宫转移到湖上行舟，但仍能看出《织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承袭了《洞庭灵姻传》。前世之柳毅与龙女，实为今生之柳生和织成。

事实上，明清小说对前代故事的继承并不局限于爱情故事，还有大量的鬼怪故事以及一些充满道教色彩的神仙传说。作者借助洞庭湖这一充满玄幻色彩的异境空间，来生发新的传奇。

《幽怪诗谈》卷五《洞庭三娘》叙主人公陶愚夜下泛舟洞庭湖的离奇经历。相较于之前的小说，该故事不仅将女子的容色、体态描写出来，还把女子之间相互调笑、与陶愚寻欢作乐的场面生动展现出来，由此刻画出来的人物更加具有立体感。文末“天光已曙，三女急起披衣，跳入水中……泛鸳鸯、鸥、鹭游泳于波上”，三女分别变作鸳鸯、鸥、鹭离去，既与其先前所作诗歌形成呼应：“此生莫遣分离别，交颈成欢到白头”暗示锦衣者为鸳鸯，“一行飞起青天近，几个归来白雪轻”是谓白衣者为鸥，“岁暮江湖谁是侣，忘机常伴钓鱼舟”^{[2](230-232)}意指素衣者为鹭，又为三女的放浪行为作了解释，给人以怪诞玄异之感。

《聊斋志异》卷十二《田子成》与上述故事有相似之处：田子成之子良耜夜游洞庭湖，听闻岸上有洞箫声，上岸后“乘月步去，约半里许，见旷野中，茅屋数椽，荧荧灯火；近窗窥之，有三人对酌其中”^{[3](1628)}。这三人邀请良耜同饮，行酒令时良耜得知父亲墓地消息，其中一人言天明后为其指示。作者显然是借助洞庭湖营造了一个超越世俗的空间，使良耜得以获父骸骨并使之还家，作者在志怪的同时也借此宣扬了忠孝观念。此外，袁枚的《子不语》卷二十一“香亭记梦”条亦是借助洞庭湖所具有的玄幻色彩的异境来生发情节。

另外，还有部分小说着力描写洞庭湖流域的神仙传说，实际上是前代旨在宣扬道家思想小说的余韵。这些小说大多是在以往神仙传说的基础上铺展开来，成为洞庭湖记忆的一部分，从而为其异境空间增添了些许神仙色彩。其中，吕洞宾故事最为百姓喜闻乐见。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和邓志谟的《飞剑记》都叙述了吕洞宾在人间所做的神仙事迹。如《八仙出处东游记》第二十九回叙吕洞宾至岳阳，以卖油为名，寻“买不求添者度之”，最终却失望而归：“洞宾叹曰：‘人心贪得无厌，一至于此。’乃取其米而行。”^[4]《飞剑记》第十回则叙吕洞宾至岳阳展现仙家法术：“好一个道人，呵气一口，就如幽谷生春，只见桃树生蕊，李树含英。”“只见那葫芦奇异，离人有丈余，上也上不去，下也不下来，飘空的悬在那个所在。”^[5]神仙和爱情故事发生在洞庭湖畔，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是在文人的心灵世界形成并流传的，存在于和现实相对立的想象空间。

(二) 水灾与匪患：明清小说中洞庭湖书写的变异

洞庭湖虽有诗意，但也充满着底层社会的愁苦。现实中的洞庭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小说家们对诸多历史事件进行回忆，并将其付诸笔端。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尔托认为，“文学是一段‘合乎逻辑的’历史表述，文学的虚构使历史可以被思考”^[6]。小说家正是带着对历史的思考和见解，将洞庭湖流域

发生的自然灾害及社会动荡写进小说,在虚构的同时又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述历史,因此形成了明清小说对洞庭湖书写的变异。

湖南虽然北部有滨湖平原,但有八百里洞庭湖,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洞庭湖成为阻隔中原地区和湖南的一道天险,而这道天险形成的一大原因便是洞庭湖的浪急风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曾“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7]。唐代以来,诗文中大量的洞庭湖风浪描写,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8](1633)},白居易《题岳阳楼》“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9],欧阳修《偃虹堤记》更是将洞庭湖看作一个险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10]

此外,唐传奇《湘媪》言洞庭湖大风掀翻了巨舟:“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泊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11](2291)}将载百余人之船称为巨舟并不为过,然而如此巨舟却被洞庭湖大风吹至君山而碎。作者通过强调船之大、人之多来凸显洞庭湖的风浪之可怕,将洞庭湖残酷的一面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又,《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五“湖南马氏”条载:“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12]这些材料从不同方面描述了洞庭湖风浪之险,但并未谈到风浪带给人们的危害。

至明清时期,洞庭湖的风浪,掀翻了越来越多行人的舟船,以生命为钟椎在小说家的洞庭梦中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小说家意识到洞庭湖风浪中隐藏着噬人的危险,纵观此类小说对洞庭湖风浪的书写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对洞庭湖风浪的描写数量远超以往。明清以前,仅有《湘媪》《郑德璘》等少数小说在描写洞庭湖时提及风浪之险;而明清时期,描写洞庭湖风浪的小说数量明显增多,《虞初新志》《聊斋志异》《子不语》中皆有多篇故事描写洞

庭湖风浪,《聊斋志异》中以洞庭湖为背景的故事更是无一不对风浪有所描写。

二是明清以前,小说中对风浪的描写仅有“有大风涛”“暴风忽至,波如连山”等寥寥数语,明清小说则描写更为详细。如《聊斋志异·织成》:“舟人始自艖下出,荡舟北渡,风逆不得前……少时,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顾湖舟,一时尽覆。生举界方危坐舟中,万丈洪涛,至舟顿灭,以是得全。”^{[3](1513)}先是舟逆风难行,随后波浪遮天覆舟,最后洪涛竟高至万丈,将洞庭湖的风急浪高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袁枚《子不语》卷七《夏太史说三事》:“舟过洞庭,值大风浪,诸船数千,泊岸未发。夏性急,欲赶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风而行,诸船随之。扬帆至湖心,风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13]。“天地昏冥”意指风之大,乃风卷尘土所致,“白浪如山”是为浪之高,乃风推湖面而成。只有大风才能将陆地尘土带至湖心,又在湖面激起如山高的白浪。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明清以前的文言小说囿于文体和篇幅的限制,故而对洞庭湖的风浪之险,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随着明清小说尤其是章回体小说的蓬勃发展,作者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展现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的发展过程,便将洞庭湖的风浪描摹得更加细腻,以便铺展更多的文本信息,从而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三是明清小说不再单独描写洞庭湖风浪,而是将其与神仙等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从而增添神异色彩。如张潮《虞初新志》卷一“汤琵琶传”叙汤应曾弹曲定风涛一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14],面对洞庭湖上狂风大作、波浪滔天,惯常在洞庭湖驭舟的舟人都惊慌失措,可见此次风浪之险。而在这种危急关头,应曾淡然坐弹《洞庭秋思》,使风浪稍定。此处运用夸张手法,以洞庭湖风浪反衬应曾的琴技高超,颇具奇幻色彩。《聊斋志异》卷十二《竹青》述神鸟挥翼起风浪:“群鸟怒,鼓翼掀波,波涌起,舟尽覆。”^{[3](1517)}博陵纪棠氏《俗话倾谈》一集卷三中亦有相关描写:“杨崇兰之恃势欺人

欺物，不知几何。其后二子亚况亚梯，贩运于岳州，经过洞庭湖，遇大风覆舟，沉水而死。”^[15]在这一体现因果报应的故事中，洞庭湖的大风是类似于神佛等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角色，这是对洞庭湖风浪之险的正面书写，同时也宣扬了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

明清小说家对洞庭湖的改塑，除了铺陈自然灾害外，另一个关键即增加了人祸的内容，这是明清以前所不具备的，是新增的艺术加工。明清小说家开始着力刻画洞庭湖流域的不安，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水贼猖獗，过路人往往有破财或丧命的危险，如《二刻拍案惊奇》《三刻拍案惊奇》《杏花天》等小说中都有水贼劫掠或杀害路人的相关描写；二是官府讨伐水贼或水贼造反北伐而引起的一系列战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水浒传》《永庆升平前传》《新世鸿勋》《说岳全传》《吴三桂演义》等小说就有涉及。

小说家或是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这些作乱事件，将其艺术加工并在其中表达自己的历史认知。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先叙水贼势力之大，为后文劫掠一事做好铺垫：“这洞庭湖八百里，万山环列，连着三江，乃是盗贼渊藪……(柯陈)其族负险善斗，劫掠客商。地方有亡命无赖，多去投入伙中。官兵不敢正眼觑他。”^{[16](534)}水贼们占据洞庭湖，依靠洞庭湖之险劫掠行人，又有从周边地区而来的“亡命无赖”加入，这既点明了水贼的恶劣行迹，又指出水贼势力仍在不断壮大。官兵甚至“不敢正眼觑他”，从侧面突显水贼的凶残狠辣。汪秀才携爱妾回风至洞庭湖游览，不幸被水贼窥见回风美色，水贼竟招来“一二十彪形大汉”将回风抢去：“船里跳起一二十彪形大汉来，对岸上大汉声喏。大汉指定回风道：‘取了此人，献大王去。’众人应一声，一齐动手，犹如鹰拿燕雀，竟将回风抢到那只船上。拽起满篷，望洞庭湖中而去。汪秀才只叫得苦。这湖中盗贼去处，窟穴甚多，竟不知是那一处的强人弄的去了。”^{[16](535)}作者通过“跳”“指”“拿”“拽”等一系列动词将水贼抢人

的过程描写得活灵活现。这一连串熟练的动作背后，是无数遭到水贼劫掠的家庭或个人。作者并没有直写水贼劫掠的时间长短、劫掠的人数多少，而是以一次寻常的劫掠过程的描写，暗示了洞庭湖上“盗贼渊藪”，百姓深受其害，从而与前文所作的铺垫形成呼应。另外，“竟不知是那一处的强人弄的去了”，以一寻常语道出洞庭湖水贼不仅势力强盛，而且数量众多。

有的小说不仅在叙述过程中充分展现水上劫掠的特点，还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百姓被迫为贼的原因，展现出作者浓厚的地理认知和人文关怀。如《三刻拍案惊奇》第十二回：“只见上流飞也似一只船来，水手一齐失色，道：‘不好了！贼船来了！’石不磷便掣刀在手。那船已是傍将过来，一挠钩早搭在船上，一个人便跳过船来。那石不磷手快，一刀砍断挠钩，这边顺风，那边顺水，已离了半里多路……石不磷举刀便劈，秦凤仪说道：‘不可，不可！这些人尽有迫于饥寒，不得已为盗的，况且他也不曾劫我，何必杀他！’”^[17]水贼用挠钩使贼船靠近民船，然后跳到民船上打劫舟中行人。不同于陆地抢人的一系列动作，水上劫掠要受水面状况影响，小说家在描写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水贼出场时顺流而下，快速追至行舟，而行舟在水上避无可避；石不磷利用两边顺风顺水的差距脱离贼船，双方的行动皆体现出对地理条件的利用。秦凤仪所言实际上是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对百姓的怜悯和关怀，作者认识到有些水贼并不是有心为恶，而只是“迫于饥寒，不得已为盗”。另外，还有一些水贼不仅谋财，还害命。小说对此亦有所反映，《杏花天》中的傅贞卿外出贸易贩运药材，途经岳州时在湖中被舟贼砍死便是一例。

盗贼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扰乱一方，还会威胁朝廷安定。由此，便引发了官府讨伐水贼的战争。杨么起义便是典型代表。据《宋史》卷二十七载：“杨太众益盛，自号大圣天王，立钟相少子子义为太子。”^{[18](504)}杨太众即为杨么，钟相则是之前的义军首领。钟相死后，杨么等人率军占据洞庭湖，自立为王。杨么造反后，朝廷派岳飞攻打杨么，很快便平定洞庭湖之乱。即便如

此,杨么起义仍在洞庭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清小说对这次起义多有反映,然而小说家的态度却褒贬不一。如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就提到杨么占据洞庭湖称王一事,“却说洞庭湖先有贼首钟相,以妖术作乱败死,部下贼将杨么聚其余党,自称大圣天王,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与杨么俱僭称王号,据洞庭湖……聚兵数万,战船数千只,东抢岳州,西抢澧州,北据江陵,南占潭州”^{[19](433-434)},着力塑造杨么作为水贼四处劫掠的负面形象。而钱彩《说岳全传》将杨么的势力描写得更为强大:“(笔者注:杨么)他在这洞庭湖中君山上起造宫殿,自称为王。他有个亲弟名叫小霸王杨凡,有万夫不当之勇。有军师屈原公。元帅雷亨……有喽罗数十万,战将千员。粮草甚多,大小船只不计其数,十分猖獗。”^[20]手下贼兵从“数万”变为了“数十万”,船只更是从“数千只”增加到“不计其数”,这一数量的变化实为作者欲以杨么之强势突出岳飞之智勇双全。“贼兵”“猖獗”等词更是体现出作者对此次起义的批判态度。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则以宋江等人被害作为开头,借罗真人之口说出昔日梁山好汉“今各已托生入世”,又借燕青、公孙胜之眼揭示宋江和卢俊义转生之身份:“燕青、公孙胜已晓得妖儿是宋公明,魔儿是卢俊义,俱各改头换面,托生在此。”后妖儿改名杨么,魔儿改名王摩,二人并各路豪杰在洞庭湖君山聚义:“不一时,祭礼齐备,共拜天地山川……王摩只得坐了右首第一把交椅;杨么坐左首第一把交椅。其余众兄弟分坐两旁。”^{[21](340)}该书将杨么等人作为昔日梁山好汉转世,既增添了人物的传奇色彩,又暗示了杨么起义的原因是官府贪污腐败、百姓难以安居乐业,从而实现为杨么起义正名的目的。

作为小说故事空间的洞庭湖蕴含着双重镜像:一方面,它是虚幻的镜像,是作者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镜像,却创造出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景观。这种对倒、交错的双重镜像既有重合的一面,也有分离的一面,实际上体现了小说家对洞庭湖这一文化空间的思考,映射出这

一时期人们对洞庭湖不同维度的理解。虽然这些镜像的拼合,并不意味着可以构成一幅认识洞庭湖完整的图景,但是对洞庭湖文学书写的挖掘,会让人们对洞庭湖的认识更加丰富且深入,并逐渐切入本质。

二、明清小说洞庭湖书写双重镜像形成的历史语境

如上所述,明清小说的洞庭湖书写一方面将其作为超脱世俗的异境空间,书写爱情和鬼怪故事;另一方面又关注现实空间,表现洞庭湖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威胁,实录其事,进行历史书写。那么,为何会形成明清小说“洞庭湖”书写双重镜像?以下将进行具体论述。

(一) 历代文人对洞庭湖的异境想象

明清小说将洞庭湖作为异境空间,讲述一个个神仙鬼怪和爱情故事,形成了洞庭湖奇异和浪漫的文化记忆。然而,洞庭湖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当作超脱世俗的异境空间,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正如孙福轩所说:“而小说,作为文艺之一种,自是文人心目中的世界图景,所谓的空间营造,也就不是单纯向度上的地理概念,而是赋予一种象征与隐喻的精神内涵,是小说作者心中理念的诗意化、意象化生成。”^[22]洞庭湖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经过历代文人不断想象和书写,获得了“象征和隐喻的精神内涵”,才最终完成了从自然空间到异境空间的转换。

洞庭湖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23],秋风袅娜,湖水浩渺,木叶飘零,勾勒出一幅朦胧悠远的洞庭秋景图。随后洞庭湖频频出现于文人笔下,如南朝陈阴铿所作《渡青草湖诗》“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24],碧绿的湖水与天际相接,倒映在湖中的太阳,其光影随着波纹而荡漾,从而展现出湖水浩瀚、水天一色的壮阔景象。唐以后,对洞庭湖美景的描写越来越多:宋之问《洞庭湖》“风恬鱼自悦,云夕雁相呼”^{[8](621)}、张说《游洞庭湖湘》“缅邈洞庭岫,葱蒙水雾色”^{[8](932)}、白居易《题岳阳楼》“春岸绿时连梦

泽，夕波红处近长安”^[9]等皆是对其瑰丽壮阔之景的书写。在这些诗人笔下，洞庭湖还只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是文人前往贬谪之地途中的一处美景。

与此同时，唐代小说家“始有意为小说”^[25]，有不少篇目是以洞庭湖作为故事发生地，如《洞庭灵姻传》《湘中怨解》《郑德璘》《湘媪传》《江叟传》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洞庭灵姻传》写柳毅和龙女的人仙之恋，二人最终“相与归洞庭”^{[11](657)}，既写浪漫爱情，又写神仙之事，兼具浪漫和玄幻色彩。此时小说中的洞庭湖便由现实空间逐渐转变为文人想象的异境空间。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改革，大多数小说家科场蹭蹬，处在社会中下层，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再加上朝廷对思想的束缚，他们只好在洞庭湖这一异境空间驰骋想象。扬·阿斯曼指出：“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它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一些这样的地点，并对其加以保护，因为这些地点不仅为群体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而且是他们身份与认同的象征，是他们回忆的线索。”^[26]也就是说，任何群体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地点，该地点为对应群体提供了象征意义，洞庭湖便是一个典型，它作为异境空间而承载历代文人记忆。当明清小说家不断讲述洞庭湖神仙鬼怪和爱情故事、为洞庭湖增添新的记忆时，他们便进入这一空间，并成为了前代文人群体中的一员，从而获得浓烈的文人身份认同感。因此，明清小说对洞庭湖异境空间的书写层出不穷。

（二）明清小说家对洞庭湖的历史认知

如果说明清小说以洞庭湖为背景的鬼怪和爱情故事，是对洞庭湖的异境空间的探索，那么其对洞庭湖自然灾害和水贼作乱造反的书写，则是将目光重新投向现实空间。自然因素是文学作品的影响因素之一，对文学的产生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以洞庭湖的自然状况为切入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清小说家将目光投向现实空间的原因所在。

北宋以来朝廷开始在洞庭湖围垸造田，洞庭

湖水域面积受到影响，蓄水能力也有所削弱。明代更是大规模开展围垸造田，由此导致湖泊汛期的洪水容蓄量减少，自然洪水位抬升，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水灾^[27]。清朝实施圩垸制，围垦农田，“由于圩垸制的蓬勃兴起，湖泊洲滩被大面积围垦为农田，原有的水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再加上此时“湖区堤防建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筑堤挽垸从事围垦种植，其实质就是与水争地”^[28]。此时期洞庭湖的水域面积和蓄水量都大幅降低，因此在大雨时发挥不了蓄水防洪的调控作用，在大旱的时节又缺乏充足的储蓄水源，导致应对水涝旱灾的能力减弱。由此可以解释宋代水涝灾害尚不频繁，而明清两朝发生的频率却远高于前代的现象，给周围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如常德“(成化)二十三年，大旱，谷米甚贵，道殣枕藉”，“(正德)八年四月八日，大风雨雹骤作，吹倒民居牌坊，屋瓦如飞，江舟多覆”^{[29](68)}。嘉靖时期的水灾尤为严重，死于水灾者不计其数，如“嘉靖十年四月，湘阴大水，溺死男女无算”^[30]，“十二年，(常德)淫雨，自四月至于六月，江水泛涨，几破城，滨江之民，遭淹没者无算”^{[29](69)}，“十五年，石门大水，漂流民居。七月，澧州大水，溺死者以千计”^{[31](11)}。到清朝仍然发生多次严重的水涝旱灾，如长沙“(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大水，平地深五六尺，漂没人民、房屋、牛马无算，同日山多坍塌”^[32]。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却未能实施积极有效的赈灾措施，无疑让百姓雪上加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现象，如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岳州大旱，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慈利、华容、安乡，人相食，正月华容大疫”^{[31](10)}。整年无雨，田地绝收，百姓无以为食，竟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可见饥荒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之重。

此外，明初朱元璋因洞庭湖曾为陈友谅的粮秣后方，故意加重该地区的赋税以示惩罚^[33]。农民赋税重，生活艰难，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便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如《常德府志》载：“(嘉靖)五年大旱，是年流贼张广胜、史剑等数百人四散劫掠杀殍。”^{[29](69)}《明神宗实录》卷395亦称：“奸僧妖妇，左道惑人，流民饿夫，揭竿

鼓众，而大盗起矣。”^[34]百姓受难，又受人蛊惑，不得已为盗，由此可知，洞庭湖地区盗贼猖獗绝非无源之水，而是有着现实的积淀。《明史》还记载了流民和百姓造反的事迹：“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通窜入为妖言，潜谋倡乱。石龙者，号石和尚，聚众剽掠，通与共起兵，伪称汉王，建元德胜，流民从者四万人。”^{[35](4596)}而在正德五年，“沔阳贼杨清、丘仁等僭称天王、将军，出没洞庭间。围岳州，陷临湘，官军屡失利”^{[35](4958)}。在杨清等人造反之前，洞庭湖已经历了数年灾荒。

需要指出的是，洞庭湖自身的地理因素在百姓为盗和农民起义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南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中原地区相距较远，又因地势阻隔使得湖南较为封闭，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甚密切，中央王朝往往缺少应有的管辖，因而为盗贼的横行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洞庭湖志》载：“洞庭界连四郡，港汊丛密。宋之中叶，明之末流，几为逋逃渊藪。”^{[36](94)}洞庭湖边界与四郡相连，湖面又极为广阔，边界线较长，容易成为“四不管”和法外之地，因此四郡盗贼多喜欢逃逸至此。再加上水面辽阔，又有洞庭湖风浪这道天险，盗贼们作乱害人后难以被追踪，此地渐渐成为盗贼聚集之地。此外，洞庭湖还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自设险以来，兵家所重”^{[36](135)}。天然之险的存在，使洞庭湖易守难攻。钟相、张献忠、吴三桂等历代造反者皆于南方作乱，若要北伐，必定要选一易守难攻之地作为大本营，洞庭湖便成了不二选择。据《宋史》载：“(建炎四年)鼎州民钟相作乱，自称楚王……钟相陷澧州，杀守臣黄宗。”^{[18](476)}鼎州即现在的常德，钟相、杨么起义便是以洞庭湖为根据地；《明史》卷三〇九亦载：“贼皆遁，献忠入湖广”^{[35](7970)}，张献忠造反后选择入湖广，很可能与洞庭湖易守难攻之势有关；《清史稿》卷四七四“十三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部署诸将：杨宝荫陷常德，夏国相陷澧州，张国柱陷衡州，吴应麒陷岳州”^[37]，吴三桂将部下部署到洞庭湖周边地区，亦是存有占据洞庭湖的想法。

综合明清灾害的史实，我们不难发现，明清

小说中关于洞庭湖水灾匪患的书写，并非小说家凌虚蹈空，而是有其肥沃的现实土壤。小说中灾害的描写，是作家基于个人对现实的认识把握所进行的艺术创造。

事实上涉及这一领域的，不只是小说，可以对读的还有明清诗文中的洞庭湖灾害书写，比如袁中道《彭山人洞庭遇盗，赋此谑之》、陈乐光《湖乡五首》、阎其相《苦旱行》等。与小说描写不同，诗文中的洞庭湖灾害书写是为抒情主题服务，往往采用白描式手法，篇幅与语言偏向简约，作家撷取洞庭湖灾害的只言片语或是某个具有特定意味的行为来呈现，当然也不乏摄人心魄的力量，但人物心理活动的摹写存在不足。明清小说与诗文限于文体差异，洞庭湖的叙事重点有很大不同。小说家不仅加重了“洞庭湖”书写的叙事分量，而且注重对“奇”“异”的凸显，有意识营构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呈现出细腻生动、叙事路径多样化、叙事日常化等特征。为达到上述效果，小说家不吝笔墨，对洞庭湖的描写更为纾徐充盈，让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具有画面感和流动性，从而营造出一个客观、真实的活动空间，让洞庭湖与小说人物产生较为明显的动力关系。这体现了明清小说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竭力探求洞庭湖这一文化空间的深度，尽可能挖掘其丰厚的文化意义，既有“娱心”，也有“文以载道”的责任和良知。整体而言，明清小说编织了一幅细腻可感的洞庭湖场景，远胜于史书、地方志中服务于政治叙述的片段性描述，从而促进了洞庭湖文学传统的发展。

三、明清小说洞庭湖双重镜像书写的文化史意义

如上所述，明清小说“洞庭湖”双重镜像的建构是不同知识传统相互碰撞和小说家深入参与的结果，它不仅包含了作者对洞庭湖历史的认知和反思，也展现了其对生命意义的感悟。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中原地区对偏远地区在文化上的权力审视。

(一) 史学意义：对历史的补充与反思

文学作品中对历史的书写往往能起到补史

的作用，如前所述，明清小说家凭借自己的历史认知，将洞庭湖发生的历史事件写入小说，以虚构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此类虚构叙事中，往往隐含了被历史掩埋的某些“真理”。这些“真理”可能会触及到历史的真相，从而丰富后人对历史的认知。

以杨么起义为例，官方叙述多以反贼视之，突出其作乱害人的行为事迹，如《宋史·岳飞传》载“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18](11381-11382)}，即记录了杨么欲卖国通敌的行为。这也影响了小说对其形象的塑造，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说岳全传》等都将其作为反贼描写，其主旨都是借杨么之反贼形象突出岳飞之智勇双全，从而塑造岳飞这一英雄形象。《后水浒传》所述则与史书以及其他小说不同，该书将南宋时期的杨么起义与北宋发生的宋江起义联系起来，将杨么等人作为昔日梁山好汉的转世，并在书中刻画杨么的英雄好汉的形象，如第三十二回叙杨么父母入狱，杨么去官府代父母受刑：“众役吆喝一声，将杨么推倒在地。一时间，笞杖鞭扑、夹拶敲箍，无一不用。杨么只含笑受领。”^{[21](317)}杨么听闻父母因其入狱，自首为父母受刑，而面对酷刑，只是“含笑受领”而不改其色。一方面刻画了其孝子形象，另一方面又突显了其英雄好汉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杨么正名，事实上，该书通过将杨么起义与梁山泊起义联系起来，反映出南宋末年洞庭湖自然灾害加重、百姓深受其害的社会现实，揭露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剥夺百姓的残暴恶行。此类不为史书所记载的内容，正是通过小说家的历史书写才得以展现在后人眼前。

小说家对洞庭湖历史事件的书写，不仅能起到补史的作用，还能引起读者对历史的反思。这是由小说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的历史认知所决定的，即所谓“文学的思想性或者文化内涵，更会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现实、自然和人生的某些感悟，或者追寻”^[38]。小说家以历史演义的形式，对发生在洞庭湖的战争作了深刻反映。不同于历史学家的客观描述，小说家笔下的文字往往更具感染力和共情力，包含了其对历

史的体认和思考。受众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历史认知，从而引发了个人对于历史的某种感悟。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叙岳飞讨伐杨么一战，“黄佐杨钦首登贼船，斫死其党，不计其数”，在杨么被擒后，“其余贼众杀死洞庭湖中者，水为之红”^{[19](454)}。洞庭湖一战后，湖水竟被染红，可见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人数之多。作者虽然尚未认识到杨么起义的本质，但看到了战争中生命贱如蝼蚁，体现出了对战争的反思。又如《新世鸿勋》写张献忠屠杀平民：“止留下会做裁缝的与唱戏的数千人，其余都赶至江中溺死。正是杀得：赤壁山前，滔滔血浪翻扬子。岳阳楼下，叠叠尸骸满洞庭”^[39]。作者在叙述时嵌入了个人的情感，在对张献忠残忍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凸显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这些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比冰冷的历史更能触及受众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生命的同情。这些悲悯情感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怀的记载，既是对历史的补充，也是一种新的主观历史的建构。

(二) 审美意义：生命的美感与对现实的反抗

明清时期高压思想的控制下，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受到了精神上的压抑。小说家一方面要面对朝廷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束缚，另一方面又对自己低微的社会地位产生焦虑，心中的愁闷难以排遣，只好“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40]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生命的张力也借此展现出来。明清小说家创造的洞庭湖这一异境空间，正是对现实中朝廷对他们精神压抑和思想束缚的一种对抗。小说家以虚构的方式借此处空间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展现出一种生命独有的美感。

碧山卧樵的《幽怪诗谈》卷五《长沙四老》，四叟豪情壮志，言其“皆负冲天之志、不羁之才，今虽老矣，而志未尝一日忘霄汉也”^{[2](235)}。所作诗歌中虽隐含怀才不遇、功名未成之感，但更多的是对功名利禄的不屑，如“哇而不食生齧蹙，仲子于今尚有名”^{[2](236)}，以陈仲子因认为兄长俸禄为不义之财而拒食兄长家之肉的典故，表达对功名利禄的唾弃。一方面，七旬老叟有冲天

之志、不羁之才，却无功名在身，暗示科举不公；另一方面，四叟虽无功名在身，却能相与会饮、吟诗作乐，展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这种旷达的人生境界，是对科举制度压抑人的精神的无声反抗，也是自由天性的表露。

有清一代，民族矛盾尖锐，文人们多压抑愤懑，只好将心中“块垒”以隐晦的方式诉诸笔端。如成书于清初的《后水浒传》，叙杨么等人为昔日梁山好汉的转世之身，继续行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英雄之事。他们保护平民，与官府恶人斗智斗勇，一反史书中的反贼形象。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对于杨么起义之事具有深刻的历史认知，更是由于作者反抗现实、反对异族统治的愿望所致。杨么作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其在小说中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展现出人自身所具有的敢于反抗强权的力量美。

(三) 隐喻意义：来自中原文化的目光审视

明清时期，湖南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在文化层面，依然处于边缘地带，距离文化中心较远。中原地区作为文化中心，在对待其他地区的文化时，往往带有审视的目光。这种审视是高等文化对低等文化的审视，是正统雅文化对异端蛮文化的审视。正如米歇尔·福柯《权力的地理学》所强调的：“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当人们对它们进行再现的时候，能够指引人们通过区域、地区和领土这样的概念来思考支配的形式。”^[41]换言之，当我们以知识描述某个地区或领域的时候，也就为其赋予了概念，这些概念会影响到其他人对该地区的认知。这一过程就是我们行使权力的过程，该空间也就成为了权力控制的空间。明清小说对洞庭湖的书写体现出强烈的权力观念，充满了中原地区对偏远地区的偏见和误解，这突出表现在对水贼的叙写中。

张潮《虞初新志》叙徐霞客过湘江而遭遇强盗，僧静闻被重伤而死。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写汪秀才游洞庭湖，爱妾却被水贼抢走。两者对小说情节的建构显然受到其文化认知的影响。在

张潮和凌濛初的笔下，洞庭湖水贼抢劫或伤害的对象皆是外地来的行人。这无疑是对洞庭湖的一种刻板印象，暗示了此地居民多是抢劫外地人的水贼，是对洞庭湖作为偏远地区的歧视。钱彩《说岳全传》叙岳飞讨伐杨么一事，更是中原地区对偏远地区统治权力的直接体现，作为中原文化代表的岳飞不仅能轻易劝降杨么麾下将领，还得神仙相助，不久便击败了杨么。

颇有意思的是，梦觉道人《三刻拍案惊奇》第十二回中亦有对洞庭湖水贼的描写，然而他笔下的水贼又与上述诸家有所区别。秦凤仪在洞庭湖遇水贼袭船，水贼被石不磷捉住后称：“我广西熟苗，每年夏秋之交，毕竟出来劫掠。今承分付，便当改行！”^[17]并无人问其从何而来，水贼却主动表明来自广西，这显然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将水贼写成来自更偏远地区的苗人，是为洞庭湖人民作辩护，但同时也产生了对更偏远的广西地区的权力审视。因此形成了中原地区—洞庭湖地区—广西地区的权力层级，来自中原地区的审视的目光便一层层扩散出去。对这一细节的勘察，也让我们窥见一种“去边疆化”与“再边疆化”的过程。

总之，通过对明清小说中的“洞庭湖”书写形态及原因的梳理，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文人与水乡环境的关系，这是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耦合，人在水乡环境中不可能超脱性存在，而是黏着性生存。文人在与自然的黏着中延展生命的历程，感应社会的脉搏，尤其会受到事件带来的触击”^[42]。民众对灾难并未遗忘，而是将其渗透到小说创作中，成为洞庭湖文化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故其书写形成了异境想象与现实摹写的双重镜像，既具有史学意义，也具有文学审美意义。既有一脉相承的一致性和前后关联的逻辑性，也有细微隐秘的差异性和前后转化的变异性，在承袭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文化认同，为洞庭湖文学景观“以及自身文化的更新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和张力”^[43]。

注释：

① 关于“洞庭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狭义上的洞庭

湖,是指洞庭湖这一处自然湖泊的范围,即“洞庭湖在城西南,北接华容、安乡二县,西南接常德府龙阳县,东南接长沙府湘阴县”。参见迈柱等监修、夏力怒等编纂《湖广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其囊括了附近的青草湖、赤沙湖、安南湖等等,水域面积达八百余里。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洞庭湖,是指整个洞庭湖流域,清人万年淳等编纂《洞庭湖志》载其范围:“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环湘阴。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见陶澍、万年淳修纂《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1页。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岳阳、常德、益阳、长沙、湘潭等地。本文所采用的是广义上的洞庭湖概念。

- ② 参阅谷文彬,张晓雪:《洞庭湖何以成为唐传奇最浪漫之地》,《文史知识》2021年第8期。

参考文献:

- [1] 冯梦龙. 三言警世通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48-49.
- [2] 碧山卧樵. 幽怪诗谈校注[M]. 任明华, 校注.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 [3] 蒲松龄.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 张友鹤, 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4] 吴元泰. 八仙出处东游记[C]//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120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21-122.
- [5] 邓志谟. 飞剑记[C]//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11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34-136.
- [6] 米歇尔·德·塞尔托. 历史与心理分析: 科学与虚构之间[M]. 邵炜,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6.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48.
- [8] 彭定求,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9] 白居易. 白居易集笺校[M]. 朱金城, 笺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141.
- [10]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941.
- [11] 李剑国. 唐五代传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2]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045.
- [13] 袁枚. 子不语[M]. 申孟, 甘林,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31.
- [14] 张潮. 虞初新志[M].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4: 14.
- [15] 博陵纪棠氏. 俗话倾谈[M]//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 第1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31.
- [16]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章培恒, 整理, 王古鲁, 注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7] 梦觉道人, 西湖浪子. 三刻拍案惊奇[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52.
- [18]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9] 熊大木.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M]//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 第139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20] 钱彩. 说岳全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305.
- [21] 青莲室主人. 后水浒传[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1.
- [22] 孙福轩.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化论析[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7(2): 69-74.
- [23]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65.
- [24]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452.
- [25]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211.
- [26]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1-32.
- [27] 周宏伟. 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 20(2): 12-21.
- [28] 熊剑. 洞庭天下水: 洞庭湖水文化研究[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24.
- [29] 胡向华. 康熙常德府志[M]. 清康熙十年(1671)刻本.
- [30] 阎肇琅. 嘉庆湘阴县志[M].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9)刻本: 3.
- [31] 李遇时. 康熙岳州府志[M].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
- [32] 刘采邦, 张延珂. 同治长沙县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690.
- [33] 李跃龙, 等. 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4: 74.
- [34] 明神宗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7433-7434.
- [35] 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6] 陶澍, 万年淳. 洞庭湖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 [37] 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844.
- [38] 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52.
- [39] 蓬蒿子. 新世鸿勋[M]//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 第2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87.
- [40] 湖海士. 西湖二集序[M]//周清原. 西湖二集. 周楞伽, 整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567.
- [41] 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7: 205.

5-14, 2, 161.

[42] 罗时进. 清代江南文人水乡生活的“忧乐”书写——
从日常与事件两重视角的考察[J]. 东吴学术, 2023(1):

[43] 张弛. 潇湘的衰变与晚清湖南形象的转型[J]. 中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4): 203-214.

Alien imagination and realistic imitation: Double mirroring of Dongting Lake writing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GU Wen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Dongting Lake" writing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esents a double mirror image, which is not only a foreign space that carrie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love and immortals, but also a realistic space that witnesse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disasters and turmoil, thus manifesting the consistency with the same inheritance and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as well as the subtle and hidden differences and the varia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is characteristic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Dongting Lak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reality of flood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is way, the novelists express their sentiments and concerns for the people, reflect on the value of life, and expand the borders of Dongting Lake literary landscape.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novels; Dongting Lake; double mirroring; historical context

[编辑: 陈一奔]